

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 的政治经济因素实证分析

李 磊 漆 鑫 朱 玉*

摘要: 本文运用 1985-2000 年分国家、分产业、分年度数据和混合 Logit 方法对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规模及沉没成本的角度选取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及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政治经济变量,发现政治经济因素在提起反倾销申诉和执行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规模越大,沉没成本越高的企业越具有能力和动力提出反倾销申诉。同时对政府越具有政治价值的产业,越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反倾销支持。当考察对华反倾销申诉和措施时,发现政治经济因素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加入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表明,对华反倾销裁定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关键词: 反倾销 贸易保护 政治经济因素 混合 Logit 估计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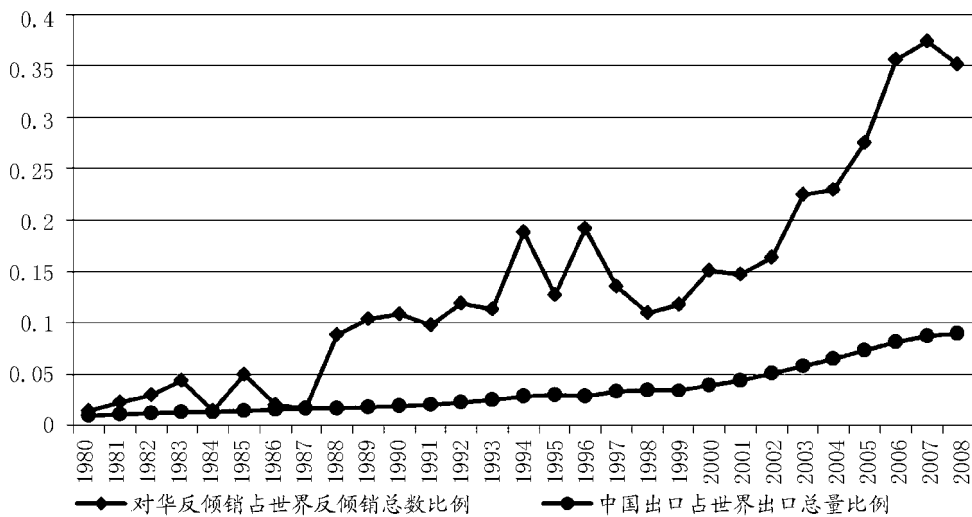
自 1904 年加拿大反倾销立法算起,反倾销制度诞生已一个多世纪。期间,反倾销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对国际贸易产生持续影响。其本身所发挥的作用也产生较大改变。最初,反倾销立法主要被用来对抗所谓掠夺性竞争,使用反倾销的国家和地区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国际贸易摩擦中,反倾销呈快速上升之势,对反倾销的使用,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相继进行反倾销立法,并频繁对外反倾销。反倾销逐步失去其保护“公平贸易”的初衷,并且取代关税等传统贸易手段,成为一种新型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Feinberg and Hirsch 1989)。

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的签署以及 WTO 的成立,各国关税大幅度削减,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受到诸多限制。反倾销相比以上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有其内在优势。首先,WTO 反倾销规则具有“合法性”,是得到 WTO 协议认可的,经过 WTO 全体成员讨论通过的法律文件。其次,反倾销具有较强针对性,可以针对个别国家、个别产品进行。再次,反倾销使用较方便。相对保障措施来说,其损害认定标准较低,有造成实际损害的举证就已足够。而且,反倾销过程完全是单边行动。由于具备以上优势,反倾销在近十多年来,日益泛滥,已成为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逐步增加,但也日益成为反倾销的受害者。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中国已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 1980 年代,对华反倾销申诉总数为 63 件,同时期全球反倾销申诉总数为 1740 件,对华反倾销申诉占全球反倾销申诉总数的比重为 3.6%。1990 年代,对华反倾销申诉总数为 323 件,全球反倾销申诉总数为 2499 件,对华反倾销申诉占全球反倾销申诉总数的 12.9%。到了 21 世纪初,对华反倾销申诉总数为 511 件,全球反倾销申诉总数为 2189 件,对华反倾销申诉占全球反倾销申诉总数的比重达到 23.3%,增长速度十分迅猛。从图 1 可以看出,对华反倾销的增加与中国出口的增加是极不对称的。两者的差距从 1980 年代的平均 2.6% 上升到了 21 世纪初的平均 18.7%。由此可见,中国遭受反倾销损害之深。

* 李磊、漆鑫、朱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nkllile@gmail.com。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贸易摩擦、争端的成因及解决机制研究”(05JZD00015),南开大学人文科学青年项目“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分析”(NKQ09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金融危机对 APEC 的影响”(2009JJD790025)的资助。同时,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资料来源: 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 (Bown 2007), 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

图 1 中国出口与对华反倾销

二、反倾销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分析: 文献综述

虽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自由贸易比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政策都要好, 因为依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可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 而政府干预经济会带来福利与效率的损失。那么为什么实际上真正能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为数极少呢? 特别是 WTO 成立之后, 随着各国关税的降低, 反倾销贸易保护更是成为各国频繁采用的贸易保护工具。

源于对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反倾销泛滥的失望, 经济学家开始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思考反倾销。J. Anderson (1993) 和 K. Anderson (1993) 建立了一个分析多米诺倾销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 认为反倾销是行政保护和自由化的一种折中。也就是说, 为了缓解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诉求, 反倾销事实上增加了政府的压力, 使政府更易于同意进行保护。Anderson (1994) 将分析进行了扩展, 博弈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由游说行为发生, 得出结论, 在反倾销过程中的游说对贸易自由化的伤害更大。

Rosendorff (1996) 将游说作为政治经济过程中的重要背景条件分析自愿出口限制和反倾销的作用, 发现游说通过影响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程度。而且相对于征税, 自愿出口限制导致的均衡为国内外企业的共谋。如果没有达成自愿出口限制, 反倾销机制将确定征收关税。此后 Pnusa (1990), Panagariya 和 Gupta (1998), Gupta (1999) 也对反倾销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 均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

在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将实际与理论相结合比较困难。因为政策的个体需求差异要求模型的细化, 但实际数据却十分缺乏。不过仍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研究。Takacs (1981) 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保障条款”成功的案例数目进行计量分析, 结论表明: 当经济增长率下降, 失业率上升, 设备利用率下降, 进口渗透率提高, 贸易收支恶化时, 援用保障条款进行保护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此外, 过去申请保护获得成功的概率越大, 新的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也越高。

Feinberg (1989) 采用 Tobit 模型研究日本、巴西、墨西哥及韩国四国 1982-1987 年间来源于美国反倾销的案例。认为汇率波动是各国发起反倾销的重要诱因, 反倾销案件数量与美元的贬值正相关, 并据此进一步分析了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与反倾销案件数量有着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分析引起了争论, Sadni-Jallab 等 (2005) 对此提出质疑, 他们采用负二项式回归方法, 比较美国以及欧盟地区宏观经济因素对反倾销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对两个国家反倾销的影响大体一致, 而 GDP 的变动只对美国的反倾销有影响, 代表经济景气状况的工业生产指数只在欧洲发挥作用。

Leidy (1997) 研究美国 1980-1995 年的反倾销案例, 考虑美国全面的宏观经济条件 (失业率、设备利用率), 国际竞争 (进口渗透率、工业品贸易收支、实际有效汇率), 上一期的反倾销申诉, 以及贸易伙伴的失业率对反倾销申诉的影响。发现国内宏观经济的萧条将强烈的促进反倾销申诉的数量, 但是国际竞争的变量

却都不显著(进口渗透率甚至与假设相悖)。然而当钢铁类产业从模型中被剔除,实际有效汇率就与申请数成显著正相关。Knetter和Prusa(2003)考察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申诉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实际汇率和国内实际GDP增长对反倾销申诉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而出口国实际GDP与反倾销申诉的相关性不明确。Aggarwal(2004)证实,在发达国家,反倾销申诉主要由国内宏观经济压力所驱动,相比而言,以国际贸易状况估计的外部压力对于发达国家反倾销申诉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加入工业附加值增长率变量后,则进口增长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进口压力会影响到反倾销申诉。Bown(2008)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进行研究,发现那些较大的产业在面临宏观经济不景气、进口压力和产业衰退时,更易于提出反倾销,政府也更倾向于对其反倾销进行支持。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反倾销进行经验分析。不过基本上针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如沈国兵(2007)、谢建国(2006)、李坤望和王孝松(2008)。值得一提的是,王孝松和谢申祥(2009)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利用混合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出口、人民币汇率、反倾销报复、关税和自由贸易协定是影响对华反倾销的重要因素。王晰(2010)引入制度变量,发现政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机构独立性等因素对各国对华反倾销起到了直接调节作用,而且,政治和社会制度还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程度间接调节各国对华反倾销行为。

同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着眼于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因素,并利用分国别、分产业、分年度的混合数据和混合Logit方法分析其对国际反倾销以及国际对华反倾销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一组二元选择数据,用1来表示该国该产业在年内至少发起1件反倾销申诉(*Dumping*),0表示没有发起反倾销。作为稳健性检验,同样用1表示该国该产业在年内至少有1件反倾销调查被执行反倾销措施(*Mea*),0表示没有被执行反倾销措施。对华反倾销也采用二元选择数据,1表示当年该国该产业至少发起1件对华反倾销申诉(*Dumpingchn*)或执行反倾销措施(*Meachn*),0则表示没有。

解释变量选取包括五个方面:

1 政治经济因素^①

首先考虑规模,大企业更有可能寻求反倾销保护,因为其可以支持调查过程中的联合诉讼费用。此外,考虑到政府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实际过程(需要考虑用什么方法计算倾销幅度,伤害认定时的数据和方法),该产业对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影响力可能影响政府的最终决策,因此会影响其寻求反倾销保护的意愿。因为政府不可不考虑就业情况对选举产生的影响(Mayer, 1984)。本文选取该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Employ*)作为代表此效应的变量。

本文还选取该产业当年固定资产增加值(*Fix*)作为政治经济变量。理由是,较高的资本投入率的企业,也会有高固定成本。但是这个变量同样可以获得一些企业层面的信息,例如沉没成本,高的沉没成本导致企业较高的政治影响力。^②

2 WTO反倾销规则

本文建立指标来检验进口导致国内企业“被伤害”的潜在证据。即在反倾销提起之前的1年间,产业产出值的变化百分比(*Outputrate*)。我们预期,那些产出减少的产业更有可能诉诸反倾销行为。这些企业能够提供充分的受到伤害的证据,并且能够指责这些伤害是因为进口商品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的。

3 贸易压力

本文选取两个指标,其一用该产业的进口渗透率(*Imp*)来衡量,进口渗透率的计算公式为 $Imp = Import /$

^①事实上我们无法严格区分到底哪些是政治经济因素,哪些是宏观经济因素等等。因为即使是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例如进口国经济衰退、国内企业利润率下降,为了生存,企业更有可能加大游说力度,寻求政府的保护。

^②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家们有多种解释,且大多与固定成本的概念联系起来。Baumol和Willig(1981)的考察揭示,固定成本不随产出的变化而变化,但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而沉没成本并不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不过Tirole(1988)认为,固定成本只是在短期内才是沉没的,而沉没成本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创造收益流,但却永远不能加以回收。Mata(1991)定义沉没成本为:不可撤销的用于某一特殊用途,且退出时不可回收的企业成本。

GDP (Import为当年该产业进口额, GDP 为当年实际 GDP 总值), 其二用该产业的贸易盈余 (Exchange) 来衡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面临国外进口品激烈竞争的产业会具有较大动机花费资源寻求反倾销以保护其免于未来的进口竞争。较低的进口渗透率和较高的贸易盈余可能包含了该产业面临全球竞争的两种情况, 一是该产业已经被高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所保护; 二是该产业具有较高的全球竞争力。当然进口渗透率也可作为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根据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4) 保护待售理论, 对于有效组织起来的行业, 进口渗透率越低, 贸易保护率越高; 相反, 对于那些没有形成利益集团的行业, 两者间则呈正比例关系。对华反倾销的分析采用双边进口渗透率 (Impchn) 和双边贸易盈余 (Exchangechn)。双边进口渗透率的计算公式为 $Impchn = Importchn / GDP$ (Importchn 为当年该产业从中国的进口额)。

4 宏观经济

当反倾销主管部门使用产业层面的数据来进行伤害认定的同时,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 宏观因素同样对反倾销的使用产生了影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处于商业周期的衰退期, 那么这个国家的企业就更可能提起反倾销。本文希望得到实际 GDP 增长率 (Gdprate) 与反倾销调查呈负向关系。由于本文其他变量均为产业层面的变量, 且包括产业产出值的变化百分比, 因此本文将宏观经济因素在每个模型中单独加入。

5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已经考虑了不同产业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情况。那么有哪些产业会利用反倾销政策保护其免受进口竞争? 较多的分析已经发现, 钢铁业 (Steel)、化工产业 (Chemistry) 和塑料橡胶产业 (Plarub) 都是反倾销保护比较严重的产业。

分析同样包括了一个二元指标, 该产业是否在过去的 5 年里发起过反倾销指控 (Antipast), 我们期望这个变量的相关性是正的。在过去发起反倾销指控的产业, 将来较有可能会继续发起反倾销指控。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为 15 个国家、28 个产业, 时间跨度为 1985-2000 年的不平衡面板数据。对华反倾销的数据, 则为扣除中国后的 14 个国家。用于经验分析的反倾销数据是产业层面数据, 包括反倾销调查、结果、影响的产品、涉及的国家。这些数据最初来自于原始的政府报告, 之后被 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 (Bown, 2007) 所整理。根据 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 的数据可得性, 选取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阿根廷、南非、巴西、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埃及共 15 个国家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此后将反倾销所涉及的产品按三位 SIC 进行分类。按三位 SIC 分类的贸易、就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TPP 数据库 (Nicita and Olarreaga, 2006)。TPP 数据库具有全面的 28 个分类的三位 ISIC 产业层面跨国数据, 这些数据起始时间根据国家不同各有不同, 大部分在 1976-2004 年之间。此后将反倾销数据根据 TPP 的产业层面数据的可用年份进行调整。GDP 和 GDP 增长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按三位 SIC 分类的对华贸易数据同样来自 TPP 数据库。Exchange 和 Exchangechn、Fix 的计量单位为百万美元。表 1 为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umping	0.1250	0.3308	0	1
Mea	0.0893	0.2852	0	1
Dumpingchn	0.0376	0.1904	0	1
Meachn	0.0301	0.1708	0	1
Imp	0.6087	2.5031	9.39E-06	79.587
Impchn	0.0141	0.0746	0	2.4465
Employ	0.0032	0.0042	2.29E-06	0.0407
Chemistry	0.1429	0.3500	0	1
Plarub	0.0714	0.2576	0	1
Steel	0.1429	0.3500	0	1
Antipast	0.2470	0.4313	0	1
Fix	0.9107	2.2018	-0.0271	25.90
Outputrate	0.0950	0.2866	-0.9718	4.9160
Exchange	0.3824	3.4259	-27.60	42.80
Exchangechn	0.0047	0.3234	-3.4528	5.1984
Gdprate	3.7227	4.2231	-13.1	12.2

四、计量模型

本文的计量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了一个混合 Logit模型, 研究不同国家决定是否寻求反倾销调查的因素。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文同样估计了一个混合 Logit模型, 研究不同国家决定是否执行反倾销措施的因素。

根据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RUM), 假设个体 $i(i = 1, 2, \dots, N)$ 面临 J 种备选方案 (alternatives), 那么 i 个体会得到他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个体 i 选择第 $j(j = 1, 2, \dots, J)$ 个备选方案的效用 U_{ij} 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可观测 (observed) 效用部分, 它依赖于可观察到的备选方案的属性和个体的特征; 另一个部分是不可观测 (unobserved) 效用部分 (即误差项), 它代表了不可观测因素对个体选择的影响。即:

$$U_{ij} = V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 V_{ij} 代表可观测效用部分, ε_{ij} 代表不可观测效用部分。

则个体 i 选择 j 备选方案的概率等于备选方案 j 能提供最大效用的概率:

$$P_{ij} = \text{Prob}(U_{ij} > U_{ik}, \forall k \neq j) \quad (2)$$

$$= \text{Prob}(V_{ij} + \varepsilon_{ij} > V_{ik} + \varepsilon_{ik}, \forall k \neq j) \quad (3)$$

$$= \text{Prob}(\varepsilon_{ik} < \varepsilon_{ij} + V_{ij} - V_{ik}, \forall k \neq j) \quad (4)$$

通过对 ε_{ij} 的分布做不同的假设, 可以推导出不同的离散选择模型。若假设 ε_{ij} 服从独立同分布的 I 型极值分布^①, 则可以推出下面的多项 Logit 模型选择概率:

$$P_{ij} = \frac{e^{V_{ij}}}{\sum_k e^{V_{ik}}} \quad (5)$$

可观测效用 V_{ij} 通常设定为线性参数形式: $V_{ij} = \beta'X_{ij}$, 这里 X_{ij} 是可观测到的解释向量, 它包括备选方案 j 的属性变量和个体 i 的特征变量; β 是反映个体偏好的待估参数向量, 则 (5) 式变为:

$$P_{ij} = \frac{e^{\beta'X_{ij}}}{\sum_k e^{\beta'X_{ik}}} \quad (6)$$

多项 Logit 模型参数值 β 被设定为固定值, 所以不能反映个体偏好的变化; 并且多项 Logit 模型隐含着独立性及独立同分布假设, 这些限制往往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而混合 Logit 模型则放宽了这些假设, 其方法是假设 β 服从某种概率分布, 则个体 i 选择 j 备选方案的概率为:

$$P_{ij} = \left[\frac{e^{\beta'X_{ij}}}{\sum_k e^{\beta'X_{ik}}} \right] f(\beta | \theta) d\beta \quad (7)$$

其中 $f(\beta | \theta)$ 是 β 的概率密度函数, 可以设定为正态分布、均匀分布、三角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等, 可依研究者对数据的探索情况而定; θ 为该密度函数的待估参数。

混合 Logit 模型假定参数向量 β 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体现了个体选择偏好的随机性特点; 同时混合模型也不具有独立性性质, 因为当利用式 (7) 计算选择概率比 P_{ij}/P_{ik} 时, 由于积分式中的分母无法消掉, 所以 P_{ij}/P_{ik} 不再仅与备选方案 j, k 相关, 而与所有备选方案有关。

由于混合 Logit 模型的选择概率表达式是非封闭的, 故需要通过数值模拟方法 (simulation) 进行求解, 一般采用极大化模拟似然估计值 (maximum simulation likelihood method MSLM)。步骤如下:

1 在给定 θ 的前提下, 从密度函数 $f(\beta | \theta)$ 中抽取一个随机向量 β^r , 记作 β^r , 并记 $r = 1$ 表示是第 1 次抽取。

2 根据 β^r 计算 Logit 选择概率值:

$$L_{ij}(\beta^r) = \frac{e^{\beta^r X_{ij}}}{\sum_{k=1}^J e^{\beta^r X_{ik}}} \quad (8)$$

^① 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分别为 $f(\varepsilon_{ik}) = e^{-\varepsilon_{ik}} e^{-e^{-\varepsilon_{ik}}}$ 和 $F(\varepsilon_{ik}) = e^{-e^{-\varepsilon_{ik}}}$ 。

3 重复 (1)、(2) 步骤 R 次并计算 $L_{ij}(\beta^r)$ 的平均值, 作为选择概率 P_{ij} 的模拟值:

$$\hat{P}_{ij} = \frac{1}{R} \sum_{r=1}^R L_{ij}(\beta^r) \quad (9)$$

其中 R 是从某种概率密度中抽取的次数。常用的抽取方式有两种: 伪随机序列 (pseudo-random sequence) 和半随机序列 (quasi-random sequence)。前者的主要缺点是随机变量会出现群聚 (clustering) 现象, 因为有些区域没有样本点, 有些区域样本点则太集中, 使得模拟结果的误差较大; 后者 (如 Halton 序列) 克服了样本点的群聚现象, 能够均匀地分配样本点, 使得模拟误差降低。

4 根据模拟值 \hat{P}_{ij} 构造模拟似然函数:

$$SL(\theta) = \prod_{i=1}^N \prod_{j=1}^J P_{ij}^{\hat{d}_{ij}} \quad (10)$$

其中若个体 i 选择备选方案 j 则 $d_{ij} = 1$ 否则 $d_{ij} = 0$ 取 (10) 式的对数形式得到模拟对数似然函数:

$$SLL(\theta) = \sum_{i=1}^N \sum_{j=1}^J d_{ij} \ln \hat{P}_{ij} \quad (11)$$

5 运用极大化模拟似然方法解出参数 θ 的估计值。

五、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估计各因素影响国际反倾销的结果。表 2 报告了基本的混合 Logit 模型的估计。其中模型一和模型二报告了反倾销申诉的计量结果, 因变量是该产业是否发起一个反倾销申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包括 *Employ*、*Chemistry*、*Steel*、*Antipast*、*Fix*。

解释变量的符号基本上同之前的分析一致。根据理论, 对产业的保护越具有政治价值, 面临越多进口竞争, 具有较大的资本花费, 面临产出的大量下降, 那么更有可能发起反倾销调查。虽然有些效应的估计并不在统计上显著, 但得出的结论与理论还是较为接近的。宏观经济的下降也会导致反倾销使用的增加。化学和钢铁业比其他产业更可能使用反倾销。那些在过去的五年里受到反倾销保护的企业也更可能使用反倾销。

Employ 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如果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大, 那么一方面说明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 是国家的支柱产业。维持该产业的正常运行, 对保持其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说明该产业具有较多的政治资本与实力, 能够对政府产生较大政治压力。其所解决的就业越多, 对其的保护就能够给政府带来较多的选票与政治支持。

Fix 变量为正值, 且通过较高显著性水平。说明如果该产业投入的固定资产较高, 那么就会提起更多的反倾销。投入的固定资本较高, 代表该产业的沉没成本较高。沉没成本构成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重要壁垒, 同时也是影响企业退出特定市场的重要因素。在考虑退出某特定市场之前, 企业必须考虑已投入且重新进入时需要再次投入的沉没成本。因此沉没成本较高的企业如果面临较大的进口压力, 有更大的可能性劝说政府, 并提出反倾销申诉。

Chemistry 和 *Steel* 均为正值, 并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反倾销主要集中在化工以及钢铁产业。该类产业有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困难, 并且这两个产业工会势力一般较为强大。因此, 要求贸易保护的较大。

Imp 的符号为负,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进口渗透率的符号为负说明提起反倾销的企业, 往往是那些能够有效组织起来的行业。其能够形成利益集团对政府进行劝说并施加压力, 迫使政府对其实行贸易保护。因为根据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4) 保护待售模型理论, 对于有效组织起来的行业, 进口渗透率越低, 贸易保护率越高。

Antipast 显著为正, 一方面表明了反倾销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一旦某个产业采用了反倾销政策, 那么在将来其将很难取消这个政策。虽然 WTO 规则的第 11 章规定了强制性的“日落条款”, 这个条款对于已经实行的反倾销的取消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Moore, 2006)。

模型三和模型四报告了反倾销措施的计量结果, 因变量是该产业是否最终获得反倾销措施的保护。在

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显著的变量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同样显著。而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不显著的变量 *Exchange* 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变得显著; 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不显著的变量 *Ouptrate* 在模型四中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反倾销申诉和反倾销措施所代表的内涵不同所决定的。由于反倾销申诉的提出是企业行为, 虽然一个理性的企业在提起反倾销时会考虑政府的行为对其反倾销成功率的影响, 但是毕竟企业是否提出反倾销主要还是依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而决定。而反倾销主管部门裁决倾销是否成立会比企业考虑更多的问题, 例如该产业的进出口差额与该产业的产出增长率都可能是政府在调查该产业是否受到“实质伤害”时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当 *Ouptrate* 下降, *Exchange* 减少时, 政府认为该产业受到“实质伤害”的概率增加, 于是裁决倾销成立的可能性也增加。

表 2 产业层面因素影响反倾销申诉的回归分析

变量名	反倾销申诉		反倾销措施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i>Constant</i>	- 3.631*** (- 12.01)	- 3.82*** (- 12.81)	- 4.02*** (- 11.64)	- 4.231*** (- 12.59)
<i>Imp</i>	- 0.0226 (- 0.40)	- 0.0203 (- 0.38)	- 0.0235 (- 0.28)	- 0.0206 (- 0.24)
<i>Employ</i>	77.922*** (3.26)	76.987*** (3.29)	66.5** (2.22)	65.9** (2.24)
<i>Chenistry</i>	0.94** (3.86)	0.925** (3.90)	1.058** (3.59)	1.027** (3.57)
<i>Plarub</i>	- 0.195 (- 0.53)	- 0.199 (- 0.55)	.318 (0.77)	0.313 (0.77)
<i>Steel</i>	1.166** (5.17)	1.13*** (5.16)	1.482*** (5.45)	1.451*** (5.46)
<i>Antipast</i>	1.57** (8.63)	1.694** (9.58)	1.316** (6.49)	1.43** (7.22)
<i>Fix</i>	0.0822** (2.25)	0.0791** (2.20)	0.1360** (3.23)	0.1330** (3.20)
<i>Ouptrate</i>	- 0.0386 (- 0.12)	- 0.0711 (- 0.23)	- 0.363 (- 0.87)	- 0.65 (1.67)
<i>Exchange</i>	- 0.0059 (- 0.38)	- 0.0052 (- 0.33)	- 0.0454** (- 2.35)	- 0.0427** (- 2.22)
<i>Gdprate</i>	- 0.00815 (- 0.39)		- 0.0404 (- 1.62)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产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84	3251	3084	3251
似然比	- 930	- 939	- 767	- 776

注: 括号内为系数的 Z 统计量。*** 表示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已经验证了政治经济因素在国际反倾销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国际对华反倾销是否也具有同样效应? 表 3 中的计量模型同样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了一个混合 Logit 模型, 检验不同国家决定是否寻求对华反倾销调查。作为稳健性检验, 将因变量变为对华反倾销申诉是否最终被执行反倾销措施。在自变量中的不同之处在于 *Exchangechn* 为双边贸易盈余, *Impchn* 为双边进口渗透率。

对华反倾销的结论与之前对国际反倾销的研究结论基本类似。所不同的是在对国际反倾销的回归中显著的一些变量在对国际对华反倾销中变得不显著, 例如 *Fix*、*Ouptrate* 和 *Exchangechn*。

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仍然显著的变量包括 *Employ*、*Chenistry*、*Steel*、*Antipast*。在模型七和模型八中仍然显著的变量包括 *Employ*、*Chenistry*、*Steel*、*Antipast*、*Gdprate*。

Employ 这个变量在四个模型中都显著, 显示政治资本与实力的因素在对华反倾销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当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下降的同时, 该变量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 更加强化了结论。那就是对华反倾销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不是所谓的“维护公平贸易”的问题, 而是政府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实行的贸易保护手段而已。企业提出对华反倾销也并不是因为中国产品的倾销, 而只不过是迫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而实行的一种竞争手段。

在模型七中 *Gdprate* 比较显著, 但是 *Outputrate* 并不显著, 即使在模型八中将 *Gdprate* 删除之后, *Outputrate* 仍然不显著。这与之前的分析稍有不同, 在表 2 的模型四中, *Outputrate* 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 显示对华反倾销裁决中具有特殊性的地方。一般来说, 反倾销主管部门在裁决反倾销是否成立时, 考虑 *Outputrate* 更有实际意义。但是在表 3 中, 宏观经济因素 *Gdprate* 对反倾销措施的影响更显著。这暗示不管该产业是否受到了“实质损害”, 只要当时该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好, 那么很可能对华反倾销裁决会获得肯定的通过。这也显示对华反倾销裁决的随意性, 以及反倾销措施的不合理性。

表 3 产业层面因素影响对华反倾销申诉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	对华反倾销申诉		对华反倾销措施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i>Constant</i>	- 4 457** (- 11 17)	- 4 624** (- 11 83)	- 4 262** (- 11 62)	- 4 622** (- 12 33)
<i>Impchn</i>	0 0333 (0 34)	0 0414 (0 43)	0 0879 (1 23)	0 0961 (1 35)
<i>Employ</i>	80 532** (2 57)	80 014** (2 55)	90 747** (2 89)	88 87** (2 82)
<i>Chamistry</i>	1 217** (4 08)	1 201** (4 05)	1 243** (4 16)	1 197** (4 06)
<i>Plarub</i>	- 1 501 (- 1 43)	- 1 498 (- 1 43)	- 1 446 (- 1 39)	- 1 462 (- 1 40)
<i>Steel</i>	1 147** (3 96)	1 14** (3 95)	0 974** (3 30)	0 947** (3 24)
<i>Antipast</i>	1 5** (5 82)	1 552** (6 03)	1 603** (6 49)	1 674** (6 76)
<i>Fix</i>	0 0104 (0 42)	0 0137 (0 58)	0 0035 (0 12)	0 0113 (0 43)
<i>Outputrate</i>	- 0 231 (- 0 39)	- 0 336 (- 0 63)	0 266 (0 58)	- 0 174 (- 0 34)
<i>Exchangechn</i>	0 0259 (1 20)	0 0268 (1 24)	0 0016 (0 07)	0 0036 (0 16)
<i>Gdprate</i>	- 0 0147057 (- 0 40)		- 0 071** (- 2 10)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产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638	2805	2638	2805
似然比	- 445	- 448	- 415	- 421

注: 括号内为系数的 Z 统计量。*** 表示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语

反倾销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处于不同产业的企业会为着自身利益提起反倾销申诉, 同时通过院外活动或代理人影响反倾销裁决过程。本文运用 1985-2000 年分国家、分产业、分年度数据和混合 Logit 方法对反倾销申诉和措施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论表明政治经济因素在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诉以及政府审理并执行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首先, 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寻求反倾销保护, 因为其能够支持调查过程中的联合诉讼费用。政府也会较支持该产业的反倾销诉讼, 因为该产业对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压力将影响政府的最终决策, 政府不得不考虑就业情况对选举产生的影响。这种效应在对华反倾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 沉没成本高的企业也会提起更多反倾销。沉没成本高, 企业转型难, 在受到进口较大的竞争压力情况下, 就较有可能发起反倾销申诉, 也更有可能是游说政府对其发起的反倾销申诉进行支持。而政府在调查过程中如果考虑到这一点, 可能会支持企业的反倾销申诉, 以获得更多回报。

最后, 本文还发现以下几种情况下的产业更易于发起反倾销申诉, 政府也更倾向于执行反倾销措施。产业是钢铁业和化工业产业 (这两个产业都是解决了大量就业并且工会力量强大的产业); 具有较大的贸易逆差 (导致企业面临较大的进口竞争压力); 以前曾发起过反倾销 (示范效应和累积效应); 产业处于产出下降

期和宏观经济衰退期(这种情况下企业易于提供产业受损的信息)。对华反倾销的分析发现, GDP增长率比产业产出增长率更显著地影响了对华反倾销的裁决,这显示了对华反倾销裁决的随意性及不合理性。

本文分析证明,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会对反倾销申诉和反倾销措施产生重要影响。在西方民主国家,国内的政治诉求集中反映在选举和议会投票的过程中。虽然反倾销主管部门(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过程相对独立,但却也不可能不受选民以及议会的间接影响。因此,尽早加强我国在外国选举和议会投票过程中的游说工作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贸易伙伴国家内部有影响的利益集团,要让这些利益集团分享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好处,例如有针对性地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以及鼓励中国企业去国外投资。通过使中国的利益与国外利益集团的长期利益相一致,国外利益集团会自动游说本国政府,以避免产生反倾销损害自身利益。^①

参考文献:

1. 李坤望、王孝松, 2008《申诉者政治势力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 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定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第6期。
2. 潘圆圆, 2008《中国被反倾销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第5期。
3. 沈国兵, 2007《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世界经济》第11期。
4. 盛斌, 2001《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 文献综述》,《世界经济》第1期。
5. 王晰, 2010《对华反倾销申诉的国别制度差异》,《经济科学》第5期。
6. 王孝松、谢申祥, 2009《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第12期。
7. 谢建国, 2006《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
8. Aggarwal A. 2004 "Macro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Antidump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2) 6: 1043-1057.
9. Anderson J 1993 "Domino Dumping II: Anti-dump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35(1-2): 33-150
10. Anderson, J 1994 "Strategic Lobbying and Antidumping"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9(2): 129-155.
11. Anderson, K. 1993 "Agency Discretion or Statutory Direction: Decision Making at the US ITC."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2): 915-935
12. Baumol W. J., and R. D. Willig 1981. "Fixed Costs, Sunk Costs, Entry Barriers, and Sustainability of Monopol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IT Press* 96(3): 405-431
13. Bown, Chad P. 2007. "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econ.worldbank.org/tbd/gad/>.
14. Bown, C. 2008 "The WTO and Antidump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s & Politics* 20(2): 255-288
15. Feinberg R. M., and K. M. Reynolds 2006 "The Spread of Antidumping Regimes and the Role of Retaliation in Filing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2(4): 877-890
16. Feinberg R. M. 1989. "Hirsch Barry T. Industry Rent Seeking and the Filing of Unfair Trade Complai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7(3): 325-340
17.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9): 833-850
18.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5.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4): 675-707.
19. Gupta, P. 1999. "Why Do Firms Pay Antidumping Duty?" MFWorking Paper WP/99/166
20. Knetter M., and T. Pusa 2003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1(1): 1-17
21. Leily M. 1997.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ressures for Protection Under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Law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S" *MF Staff Papers* 44(1): 132-144

^①例如欧盟对华自行车反倾销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自1993年起,欧盟认定中国自行车企业存在对欧盟低价倾销的情况,并开始征收高达30.6%的反倾销税起,国内自行车企业通过出口自行车零部件,在欧洲形成零部件进口和装配行业,几年下来部分夺回欧洲市场。当欧洲自行车工业于1996年再度向欧盟申诉时,欧洲的自行车零部件进口和装配行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一旦此次中国企业被征收反倾销税,必然殃及这些欧洲企业。中方律师团利用这支力量成功说服了7个欧盟成员国政府站到了中方一边。此外中方律师团又发现,几乎所有的欧洲申诉企业,都从中国进口自行车零部件,其中最大的一家申诉企业,就是名列申诉企业榜首的DERBY公司,它恰恰又是最大的中国自行车零部件进口商和用户,中国律师团因此对其晓以利害。就在欧盟决定立案短短两周后,这家公司就向欧委会寄去了公开撤消信,最后,欧洲32家申诉企业中,有17家企业公开宣布撤消,中方律师通过欧盟成员国政府向欧委会建议要求重新审查申诉方的申诉资格,最终使欧委会宣布无税结案。

- 22 Mata J 1991. " Sunk Costs and Entry by Small and Large Plants " In *Entry and Market Contestability*, ed P. A. Gerosky and J Schwabach 49- 62 Oxford Blackwell
- 23 Mayer W. 1984 " 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5): 970- 985.
- 24 Moore M. O. 2006 "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U. S Antidumping Sunset Review Decisions "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42(1): 122- 150
- 25 Nicita A., and M. Ollareaga 2006 " Trade,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1976- 2004 "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1(1).
- 26 Panagariya A., and P. Gupta 1998 " Anti- dumping versus Price Negotiation " *The World Economy*, 21(8): 1003- 1019
- 27 Prusa T. 1990 "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U. S Antidumping Law. " In *Ch. 2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J. A. Conybeare 41- 67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28 Rosendorff B. P. 1996 "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Antidumping Procedure and Domestic Politic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3): 544- 561.
- 29 Sadri- Jallah M., R. Sandretto and R. Feinberg 2005.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S and EU Antidumping Initiation and Decision "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Addis Ababa
- 30 Takacs W. 1981 " Pressures for Protection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 *Economic Inquiry*, 19(4): 687- 693.
- 31 Tirole J 1988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dumping Filings and Measur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Li Leiqi and Zhu Yu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dumping filings and measures over the yearly data period 1985- 2000 in the industrial level using Mixed- Logit Model. We select industry share of total employment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s political economy varia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and sunk costs.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political pressur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 dumping policy. The higher scale and sunk costs of an industry, the more possibly antidumping files and the more possibly the government protects it. In addition, it is more obviously tha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factors affect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and the arbitration on anti- dumping against China is unreasonable.

Key Words Anti- dumping; Trade Protection; Political Economy; Mixed- Logit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F13, F51, F59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74页)

Research on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Shen Liang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mode of central government- led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behavior become a key factor i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In this paper, a model is firstly constructed, then, cluster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are applied to study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behavio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wer and energy of local government is insufficient i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ecause its attention mainly focus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projects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 " three wastes" in the governance aspects, and ignore the investment an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residents' life. Existing fiscal system which property right and duties responsibilities are asymmetric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are major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establish a long- term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s, institutional reforms must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ly.

Key Words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Local Government; Cluster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H3, H7, C8

(责任编辑: 陈永清)